

## ■ 政法论苑

#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的民主协商<sup>①</sup>

张青红

(华南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中渗透着民主协商。要不要土改、要怎样的土改、怎样进行土改是土改的根本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广大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华侨、民主党派的利益。在土改进行前和土改过程中,中共就这些问题通过各种形式与各阶层人民反复进行民主协商,并最终达成共识,这不仅为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关键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民主协商

**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1-0063-05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集思广益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坚持在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中,与党外人士进行充分协商,并就共同性问题尽量取得一致意见。土地改革是建国初中共领导的三大运动之一,目的是为了消灭地主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民主协商渗透在土地改革的各个环节。其成功的经验为当今的民主决策提供了史的借鉴,其不足也同样引起人们的反思。

## 一 协商必要性分析

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发展农业生产,为工业化开辟道路,是党和政府的“既定政策”。“既定政策”同样需要与各阶层进行协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1. 土地改革任务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土地改革是要在社会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因此,它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早就说过,土地改革是“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sup>[1]17</sup>。对于建国初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毛泽东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sup>[2]25</sup>“这场战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sup>[2]74</sup>刘少奇称它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sup>[3]24</sup>,周恩来也指出“这一关不容易过”<sup>[4]156</sup>。新区土改“所以需要更加谨慎”<sup>[2]25</sup>。

新解放区各地的差异性很大,情况复杂。例如,华东新区,特别是江南的沪、杭等地区,地主兼营工商业和工商业家出租土地的人较多,不少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保有并出租一小部分的土地,在农民中有永佃权者较普遍,公田公地较多,个别地区大佃农使用土地的数量较大。对此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指出,华东各地在领导土地改革时,必须采取谨慎小心、稳步前进,与各阶层商量的方针<sup>[5]</sup>。华南新区,也极具自身的特点,其一,华侨占有很多土地,需要特殊处理,其二,公田比较多,地主占有的土地比较少,其三,商业发达、民主人士多,毗邻港澳,土地改革,震动很大。因此,1952年8月6日,广东省协商委员会方副主席在广东省、市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实行土地改革是广东农村反封建的“淮海战役”<sup>①</sup>。

### 2. 土地改革涉及各方面的利益

土地改革不仅关系到农村各个阶层也关系到城市的各个阶层的利益。很多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市民本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的土地改革引起了各阶层的关注。比如北京郊区,不少大地主兼营商业或工业。全郊区地主共有4906户,其中兼营商业或工业者占29%以上。城内工商业资本家中,有404户在郊区占有土地11750亩。此外,市内一部分劳动人民在郊区也有少量土地且又出租的大约在5500户以上<sup>[6]</sup>。武汉、长沙两市的工商业者,80%以上在农村中占有土地<sup>[7]</sup>。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土地改革涉及各阶层的利益,是各阶层的共同性问题。处理人民内部的共同性问

① 收稿日期:2012-10-29

作者简介:张青红(1974-),女,湖南邵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研究。

① 《坚决支援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广东省档案馆243-1-19

题,需要民主的方法、彼此商量的方法加以解决。

### 3. 各个阶层对土地改革存有不同程度的误解

人民内部对于土地改革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支持与拥护的。但仍有部分人士对土改有模糊认识,怀疑甚至反对进行土地改革。

首先是部分民主人士、工商业界,对土改认识模糊。比如部分工商业者认为地主的土地,是由地主自己“勤俭起家”,经过“自由买卖”的形式买得来,也是经过“自由契约关系”租出去,不应该没收<sup>[8]</sup>,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能一笔抹杀”;有的人则散布“江南无封建”的错误言论;如果要土改,“和平土改”就可以了,等等,对土改进行抵制<sup>[9]701-711</sup>。

其次,农民由于没有足够的阶级意识,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对土地改革认识不足的问题。一是“宿命论”、“变天思想”、“宗族观念”、讲“情面”、“自私”等封建落后思想,相信命运,认为“富贵有命”,不了解剥削的本质,对翻身做主没有信心<sup>①</sup>;二是胆小怕事,害怕地主,认为是“地主养活农民”,不敢向地主要田,等待工作队恩赐。划阶级时,地主怒目而视,农民不敢抬头;三是报复思想,出现打吊现象。“几千年的压迫,一旦翻身,加上饥荒所致,又有了土改队做靠山,别无顾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坚决,勇敢向前”<sup>②</sup>,从而导致土改斗争“过火”;四是对“不动富农”的政策想不通。“不动富农,穷人翻身翻半边”,“不分富农的田,还是换汤不换药”,“不动富农,为什么还称共产党呢?”<sup>③</sup>

此外,新中国是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各界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但在四个阶级联合的政体里,尽管有一致的政治利益,但毕竟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怎样既充分发扬各阶级的民主,又求得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是其路径之一。

综上所述,土地改革是一场影响整个社会变迁的改革,不仅关系到农村的各个阶层也关系到城市各个阶层的利益。同时,各新解放区情况各异,各阶层对土改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也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中共与各阶级、阶层在土改前和土改中就相关问题进行反复讨论与协商。

## 二 土地改革前的沟通与协商

### 1. 对“要不要土改”进行沟通与讨论

对“要不要土改”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人士就产生过争论。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矛盾再一次表现出来。这集中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有关方针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政策,大部分民主人士在讨论中表示赞

同,但正如上文提到,民主人士中仍有反对的声音。针对这些言论,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些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在小组会和大会上,摆事实,讲道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经过大会、小会以及各种形式的会议的协商讨论和辩论,就要不要土改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会上,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章伯钧作了大会发言,分别代表各自党派同意刘少奇的报告。民革主席李济深在发言中说:“听到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觉得这正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sup>[10]</sup>民盟主席张澜发言表示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可以早日恢复农村经济,可以增加农村生产,可以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也利于孤立地主,中立富农,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sup>[11]</sup>。黄炎培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同意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土改完成之后,不但农业生产可以大大发展,同时也为工业化开辟了道路。”<sup>[12]</sup>爱国起义将领刘文辉、卢汉等也表示,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土地。讨论中,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表示非但赞成土改,还要参加土改。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代表民主党派提出《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的建议案》,会议讨论后一致同意。依据这个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与各民主党派总部商洽,达成了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协议。

针对部分农民对土改心存怀疑的时候,各级党政部门举办各种报告会、座谈会、个别谈话、讲座、上大课等方式,邀请农民代表参加,讨论土改政策。通过与贫雇农反复交谈,贫雇农对自己的命运开始重新认识,认为自己“不是命苦,是地主作恶”<sup>④</sup>,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有消灭地主阶级。同时,经过沟通、讨论之后,一般贫雇农打通了“不动富农”的思想,说:“不动富农自耕部分,是为了叫他生产劳动”,“这样中农会安心生产了”,“人民政府还可贷款,协助贫雇农生产,不愁没饭吃”<sup>[13]</sup>。北京郊区西郊黄村贫农朱文魁说:“现在保存了富农的土地财产,大家更没顾虑,更要努力生产,发家致富了。”北京郊区小红门村贫农黄宝贵也说:“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像在农民前头划了一道线,谁也不敢冒过去,现在谁在生产上都没顾虑了。”不动富农,“地主更加孤立了。”<sup>[14]</sup>

### 2. 对“要怎样的土改”进行协商

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在土改中必须发动贫雇农,对地主进行必要的斗争。可有不少住在大城市的民主人士表露出“和平土改”、“官办土改”的幻想,他们认为土改就是分田,只要政府下一道命令,派一些懂得土地改革法的干部到农村去,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了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行了,没必要发动群众,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斗争。“土地改革,改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斗呢?!”<sup>[15]</sup>他们认为,在已试点的土改地区出现了群众对地主严重的打吊

① 《关于秋收前农民运动的方针计划的几点意见》,广东省档案馆 236-1-42。

② 《关于东江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 236-1-5。

③ 《转发湖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土改法公布后各阶层的反映》,广东省档案馆 204-3-6。

④ 《关于粤中专区农民运动的会报》(1951年8月),广东省档案馆 236-1-5。

现象,“斗争过火”,“土改偏差大”,党和国家的土改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常被土匪流氓所把持”,等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邀请有关人士进行讨论与辩论。章伯钧说:“我们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二十二年前,虽然提出过耕地农有的土地政策,却没有采取依靠贫雇农的路线,只提出发行土地债券收买地主土地的办法,结果,对于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没有实际的贡献。”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程潜说,土改中所传的偏差和错误,“有的是事实,而大部分则是匪特的造谣和顽固地主的叫嚣。”爱国将领傅作义说,“根据我耳闻目睹的事实,……(土改干部)常常是下铺地,上盖天,和蚊虫一块儿睡觉。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执行政策,时刻在怀念的是完成任务。”<sup>[9]708-713</sup>李济深在讨论中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如有发生偏差,我们当根据事实的调查研究,立即加以纠正。”<sup>[10]</sup>经过反复的协商讨论与辩论,分清了是非,最终普遍认为不能进行“和平土改”。后来的土改实践证实了只有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有系统的激烈斗争,土改才能彻底。

此外,关于何时进行土改。党外人士要求中共规定并公布一个各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时间。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黄炎培、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4人联名提出《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一案,认为土地改革在全国推行,无论干部数量和工作经验均恐不够,请先于少数地区实行,然后逐步推广。<sup>[16]234</sup>经过讨论,中共接受了此项建议案,决定“苏、浙、闽、赣、鄂、湘、粤、桂、陕、甘等十一省准备在一九五〇年秋收以后分配土地;宁、青两省,在完全汉人居住的地区亦准备秋收后进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及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则不进行;云、贵、川、康在一九五〇年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须待一九五一年秋收后进行”<sup>[17]93</sup>。

各阶层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发表了自身对于土改的意见。这些意见要么得到党和国家的认同,要么经过热烈讨论,最终在“要不要土改”、“要怎样的土改”等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 三 土地改革中的协商与讨论

在“要不要土改”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制定比较完善的土改法规,先后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分层次地组织各种会议进行座谈,集思广益。从各大行政区到省、县都制定了符合本地情况的土改办法或细则。

但在实践中,农民是土改的直接当事人,怎样进行土改,还需要与农民商量。在《土改工作干部的八项纪律》文件中第四、五条明确规定土改干部要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遇事与人民商量决定。“四、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群众意见和批评,不准欺压人民。五、一切重要问题和大家商量决定,然后推行,不要个人决定,强迫推行。”<sup>[3]208</sup>华东区也提出六大口号:“农民团结互让,干部大公无私,目的有利生产,方法民主协商,分配公平合理,结果群众满意。”<sup>[15]</sup>

#### 1. 对“怎样划分阶级”进行协商

划分阶级是土地改革的中心环节,能否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是土地改革成败的关键。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必须慎重地划分”阶级成分<sup>[18]</sup>。

为了保证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尽量不出现差错,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明确规定,必须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评定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协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村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院判决执行。”<sup>[19]343</sup>实践中,各地土改干部注意让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群众一起商量策划出划分阶级的具体办法。比如广州土改时,在“自报公议”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采取“五步两榜”的办法。所谓五步,即讲阶级、评阶级、审查阶级、通过阶级和批准阶级;两榜即在乡农民大会通过阶级后出第一榜,区人民政府批准阶级后出第二榜<sup>①</sup>。海南琼山则采取“三榜定案”的方法:划阶级小组审查出第一榜,群众评议通过第二榜,农民审核,上级批准出第三榜<sup>②</sup>。在进行划阶级之前,先讲阶级,把划阶级的标准与原则交给群众,展开“学划阶级”运动,主要通过农民代表会、贫雇农会议、青年代表会和妇女代表会、村民大会等系列会议进行。具体操作中,采取讲解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比如每讲一个阶级的标准后,就进行讨论,群众联系本村的例子试划。讲地主时,由群众举出一两户地主,大家讨论试划。把几个主要阶级标准搞清楚后,就着重讨论各阶级间的分别,如地主与富农主要是劳动与不劳动的区别,期间也举出不易区别的试划。通过讲解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广大群众就能掌握政策的基本要点。划分阶级时,以村为单位进行,先评地主、富农,后评中农、贫农、雇农。土改工作组既要注意群众的情绪又要把握好政策,所以先前酝酿协商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评地主富农时,先在农协内部做好酝酿和准备。由农协小组会、村代表会提出对象,算账、摆材料,在内部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开村民大会,叫地主到场进行评划。

#### 2. 对“怎样分配土地财产”进行协商

分配土地财产是农民内部自己的事情,这一工作,从始至终要贯彻的分配原则是:“满足贫雇、照顾中农、公平合理、民主协商、干部大公、用于生产。”<sup>③</sup>按北京郊区的土改政策,地主的土地及富农出租的土地,没收为国有,但是原来的佃户,还是原耕不动,由政府发给他们土地使用证,继续使用。所以每一行政村,就只有少数土地可以实际拿来调剂贫雇农。例如丰台西北的张仪村有204户,968人,共占有土地2985亩。实际可分配给贫雇农的,有地350亩,农具444件,大车6辆,牲口8头,房子33间。分派财产,采取自报公议。先是由需要土地农具的农民在各小组

① 《关于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报告》,广州市档案馆99-2.1-7-8。

② 《关于海南土改工作的会报》(1951年8月),广东省档案馆236-1-5。

③ 《为胜利完成广东土地改革而斗争》(1951年11月),广东省档案馆243-1-13。

自报需要土地若干亩,什么样的农具若干件。各小组根据群众自报的情况写好单子,送给工作组。主席照着自报的名单进行操作。当念到一个人,大家看他是否需要地,有地是否有劳动力能种。他要的亩数,是否太多或太少。有些人的自报,显然是很合理的。主席就喊:“某某人要几亩地,你们同意不同意呀!”下面齐喊,同意,就通过了。在有争论的时候主席就让各小组各自讨论。经过讨论后,小组长汇集意见:“我这一组同意给他多少”,或是“不给他”。如果各小组的意见还不一致,主席就喊:“了解某某人的情况的人,都说话呀!”于是大家展开讨论。等到各小组讨论的意见差不多时,主席就喊:“各小组同意给他若干亩,你们同意不同意呀!”下面齐喊同意,这就通过了<sup>[20]</sup>。分配农具,也是采用这种讨论的办法。苏南吴江县大古乡在分配土地财产时,同样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最初由区农会副主任张学温同志领导,根据政策与本土乡实况拟出草案和问题,随即召开村干部会议,反复解释说明,并以民主方式分组讨论。经各组热烈发表意见,然后汇合交流经验,再由领导同志根据讨论实况做出总结。然后有步骤地召开各村贫雇农会及各村农会,由村干部把草案传达到基层群众。基层群众也照样地分组讨论、交流经验、再作总结。最后由乡干部汇报并反映各方意见,再决定最后的实施办法<sup>[21]</sup>。其他地区也都采取协商的方式分配土地财产。在分配的过程中,农民表达自身的意见,针对问题讨论再讨论,最终达成共识,俨然是民主协商的过程。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的方面之外,还对在分配土地之后,要不要颁发土地证的问题上展开了讨论与协商。

分配土地后,要不要普遍地颁发土地证,农民和土改干部之间存在分歧。不少土改干部认为“天下是咱们的,发不发没有关系,即便发了,三、五年实行社会主义,也没有多大用处”;或者认为发土地证是单纯的技术工作,是形式问题,嫌麻烦。可农民群众却觉得“没有凭证心不稳”、“这是有关后辈子子孙孙的大事”,有了土地证,就敢安心生产<sup>[22]</sup><sup>59</sup>。经过反复的讨论与协商,最终同意颁发土地证。

## 四 简单评价

建国初期,以民主的、协商的方式完成中共的“既定政策”,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不足。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很谨慎的,对不同的意见也很尊重。那时,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协商民主”这个概念。但是,党和国家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反复与各界人士就土改有关问题进行协商与讨论的过程,俨然是一个协商民主的过程。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目的是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是专政的内容;同时中国共产党早年在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土改也取得过成功的经验,这时,党和政府动用国家的机器即可完成。可是专政是和民主相对的,在人民内部仍然要进行充分的民主。对于土改的一些具体问题,党和国家并没有仓促决策,而是广泛与各界人士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碰到不同意见,不是加以批评,而是耐心倾听,接受其正确部分。经过广泛讨论,最终决定在保持基本政策统一的前提

下,各地因地制宜,协商出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这在当时,意义十分明显。其一,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与反复的讨论。”<sup>[23]</sup><sup>50</sup>土地改革前和土地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反复讨论与协商,各阶层的人民畅所欲言,勇于表达自身的看法,体现了新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其二,中共与各界人士在“要不要土改,要怎样的土改”问题上达成共识。通过在政协、军政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会议的讨论发言及学习班、研讨班中的讨论,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认识了土地改革必要性,纷纷表示拥护土地改革法,支持土地改革。农民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也改变了听天由命的思想。正如农民自己说的:“土地改革,不但使咱们翻了身,也使咱们翻了心。”<sup>[24]</sup>其三,集思广益,中共接受了各界人士的建议与意见,防止不应有的疏忽,使决策更加正确周全,更加照顾到有特殊情况的地区。在土改进程中,对要不要分田、分谁的田、怎样分田等具体问题,先后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农民阶级等进行具体的讨论与协商,并形成一套正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实施细则与方法。

同时,土地改革中的民主协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民主协商从价值规范上讲,应该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形式。但在实践中,认为与各界人士进行民主协商,目的是为了顺利过好“土改关”,彰显其工具价值是建国初期土改中选择协商的主要出发点。比如跟工商界进行协商,是因为工商界不正确的认识给土改带来了阻力。跟其他人士进行协商,目的也是为了减少阻力,增加动力,更好地完成土改。其次,民主协商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协商主体之间的平等,可在实践中,协商主体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农民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尊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sup>[25]</sup><sup>1477</sup>。在实践中,尽管《在土改工作干部的八项纪律》中规定:“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群众意见和批评,不准欺压人民;一切重要问题和大家商量决定,然后推行,不要个人决定,强迫推行。”<sup>[3]</sup><sup>208</sup>但仍有很多土改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认为贫雇农“落后”、“贪图小利”、“易被地主收买”、“生活穷而没有时间开会”<sup>①</sup>、“新区群众落后,只好强迫命令”<sup>[26]</sup>等观点,不愿与农民商量,结果“农民意见反映不上来”。农民没有积极参与,造成“和平分田”、“形式分田”的局面。最后,人民普遍对中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恩心理。“搭帮毛主席,我们翻了身”<sup>[27]</sup>的声音,响彻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感恩能使人民更快地接受政府的有关政策,但同时却削弱了民主协商的理性。

综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和共同性问题上,采用充分的民主协商的方法达成共识,对于我们今天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仍有借鉴意义,其中的不足和缺陷也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值得反思。

① 《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广东省档案馆 236-1-1。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3] 刘少奇.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5] 饶漱石. 为完成华东土地改革而奋斗[J]. 新华月报, 1950(10):791.
- [6] 北京市人民政府. 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N]. 人民日报,1950-11-23(2).
- [7] 中南通讯. 中南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城乡联络委员会[N]. 人民日报,1951-07-16(2).
- [8] 王寅生. 为什么要保存富农经济[N]. 人民日报,1950-06-30(07).
- [9]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下册)[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 [10] 新华社. 民革主席李济深的发言[N]. 人民日报,1950-06-20(1).
- [11] 新华社. 民盟主席张澜的发言[N]. 人民日报,1950-06-20(2).
- [12] 新华社. 黄炎培在大会上的发言[N]. 人民日报,1950-06-21(1).
- [13] 冷 林. 经过整顿农会建立农代会京郊区土改开始划阶级[N]. 人民日报,1949-11-17(2).
- [14] 京市新闻. 京郊农民纷纷发表意见拥护土地改革法[N]. 人民日报,1950-07-06(3).
- [15] 胡适华. 人民民主专政在农村生了根[N]. 人民日报, 1951-05-03(3).
- [16] 许汉三. 黄炎培年谱[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Z]. 1986.
- [18] 刘少奇.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N]. 人民日报, 1950-06-30(1).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20] 冯友兰. 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N]. 人民日报,1950-03-24(6).
- [21] 林耀华. 土地改革是广泛而实际的教育[N]. 人民日报,1951-06-05(3).
- [22] 中国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 [23] 政协全国委员会研究室. 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24] 马 特. 从参观土改中得到的教育[N]. 人民日报, 1951-04-06(3).
- [2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6] 新华社. 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全省组织工作会议[N]. 人民日报,1950-07-05(1).
- [27] 天津市土改团. 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的几点认识[N]. 人民日报,1951-04-02(3).

The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in the Land Reform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ZHANG Qing-hong

(Schoo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e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permeated in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Want land reform or not”, “want what kind of land reform”, and “how to have land reform” were the basic issues of land reform, because these were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farmers’ interests, but also to those of the businessmen, intellectu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democratic Parties. Prior to land reform and during land refor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sulted with people at all levels on these issues through various forms, and finally reached an agreement. It not only provided the safeguard for land reform, but also realized people’s democratic rights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e land reform;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责任编辑 游星雅)